



为抵御外患,崇祯帝命建拱极城,虽形制精
 坚、伊若雄关,却未能挽救明朝危局。入清后,该
 城渐由军事要塞转为行政枢纽,设西路厅以治地
 方,反映出从战备守御到民事管理的功能演变,
 也折射出北京畿辅地区治理体系的复杂性与时
 代转型。

卢沟桥畔少屏障

驻兵之所

作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,卢沟桥重要的战略位置显而易见。但少数民族定都北京,如金、元、清王朝,只需背靠“老家”、专注向南即可,卢沟桥更多的是利好的作用。如在金朝初起之时,灭辽伐宋都是从北往南,故而燕京城南的卢沟河并没有发挥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。此后蒙古崛起,攻灭金朝,也是从北往南的扩张,重要的战役也都是在燕京城北的居庸关一带展开。直到元代中期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争夺皇权的大规模战争,卢沟桥才再次显示出了重要的军事价值。而中原王朝——明朝,取得天下后,卢沟桥的防御问题再次成为焦点。因为当明朝强大时,可坐镇京都,震慑四方;但当政权衰弱时,则很容易陷入被南北夹击的危险境地。



明崇祯朱祁镇像

事实也证明,到了明朝中后期,好几次少数民族都绕道卢沟桥附近对其进行挑衅。如明英宗正统年间,即土木之变时,瓦剌军就曾押着被俘的明英宗,在卢沟桥果园地界派人要挟明廷。明崇祯二年,皇太极率军直扑北京,与明军中的申甫军在卢沟桥激战,申甫军全军覆没。

而到了明朝末年,一边是东北满族的不断侵扰,一边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迅速逼近,终于使明廷陷入内忧外患、腹背受敌的险境。因此,缺少屏障的卢沟桥附近,

让江河日下的明廷统治者寝食难安。从元代的《卢沟运筏图》中也可以看出,在卢沟桥两岸,尽管有茶园酒楼等商市建筑鳞次栉比,但却并无城墙建筑或防御工事可挡,远远做不到易守难攻。

崇祯年间,涿州参将邓祖禹上疏建议在卢沟桥南岸建造御敌设施,以保障京西南的安全。“三卫兵撤回涿,昌镇

另行调发,并查理兴州卫兵,修复良乡城守,与卢沟桥南岸增建敌台。”(见《崇祯长编》)因此,为了加强卢沟桥防卫力量,崇祯皇帝便采纳了这个建议,准备在卢沟桥东岸建造一座军事城堡——拱极城,以此拱护京师。

崇祯皇帝决定建拱极城后,便命内官监太监苏元民、大司空刘遵宪、少司空魏忠乘等主管工程的官员们以及御史、府尹等12人共同估价,经研算后,他们呈上的估价为32万余银两。崇祯皇帝认为所需银两太多,于是又让御马监太监武俊重新估算。武俊的生平事迹史书记载不详,《明实录》中仅记载他于天启六年(1626年)同御马监太监孙茂霖、王莅朝等一同到山海关抚镇事宜,因协助抚镇有功,获赏银二十两、彩缎一匹。其实,武俊不仅对皇帝忠心耿耿,而且还是一位理财高手,特别熟悉营建工程等相关事宜,知道该如何节省费用。因此,经他估算后,整个工程仅需银两1495万两,还不及苏元民等人估算数额的一半儿。崇祯皇帝听后十分高兴,便正式任命武俊为修建拱极城的主持者。于是,这座肩负着拱卫京都安全的卢沟桥桥头堡——拱极城,于明崇祯十一年(1638年)正式开工。

拱极城在明清两代皆为驻兵之所,清朝在这里曾设“拱极营”,并设置过参将、都司、游击等职官。当地有首歌谣:“小小屯兵拱极城,城门三百三十钉。城上三百三十垛,城内三百三十兵。”据《皇朝文献通考》记载:“拱极营游击一人(驻扎拱极城,兼辖良乡一营),千总一人,把总二人,外委二人,额外外委二人,兵二百五十七名。”由此可见,当时拱极城驻守的军队确实有二三百人。

但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巩固,拱极城的军事重要作用也在逐渐削弱。

顺治二年(1645年),裁拱极城参将,改设都司以下官兵。康熙十七年(1678年),移拱极城都司驻天津,改设天津城守营都司以下将领四人,兵四百四十六名,其拱极城设游击以下将领四人,兵二百四十名。(见《皇朝文献通考》)从参将到都司再到游击,驻军职官级别的不断降低正是其军事地位减弱的反映。

而后,随着拱极城西及永定河两岸商户逐渐迁进城内,相继兴建酒肆、茶楼、驿站和祭祀庙宇等,拱极城单纯的军营格局开始渐渐地被打破。



重修后的拱极营

俨若雄关拱极城

拱极城在武俊的督建下,历时三年,于崇祯十三年(1640年)竣工。

全城东西长640米,南北宽320米,城墙高7.18米,周长1920米,总面积约20公顷,是当时全国最小的城池。

由于拱极城本身就因军事目的而建,为屯兵之用,所以它的形制与普通县城有很大区别,整个布局紧凑而严密。据《日下旧闻考》引《破梦闲谈》称:“卢沟畿辅咽喉,宜设兵防守,又须筑城,以卫兵,于是当桥之北(按北为东之误)规里许为斗城,局制虽小,而崇甍百雉,俨若雄关……”

由此可见,拱极城虽小但防御性极强。

根据武俊碑文记载,此城原有“城楼二座,闸楼二座,瓮城二座,角台四座,角楼四座,中心台二座,敌楼二座,小敌台四座,共有房屋十二间,马道八道,门楼八间,城上旗杆十二根”。城内没有一般县城的大街小巷、市场、钟鼓楼等设施,只有东西一条大街,东西两个城门,一名永昌,一名顺治。在东西两城门置瓮城和城楼,瓮城仅正面一门。城墙基础为6层条石,上面砌砖,内部以黄土和碎石筑实,顶上铺砌面砖3层,整个城墙比普通城墙更为厚实坚固。根据当时设防情形推测,城内可能设有军事衙署和许多军营宿舍等建筑。城里的地形为北高

南低,坡度不大,因此,城内排水也从北向南流,如今东南部城墙下尚有拱形“水窠”一个,用于城内排水之用。

由于是防御性的工程,宛平城的城墙除了比一般城墙坚实外,其设施和构造也特别注重军事上的用途。拱极城的四角都建有角台,角台上盖有角楼。南北城墙的正中间有中心台,南曰“洪武”,北曰“北极”,台上盖有敌楼。角台和中心台之间各建小敌台一座(应为兵房),南北共4座,台上还建有敌楼。这样,城墙上凡是有城台(俗称马面)的地方,都建有敌楼、角楼、房舍等以便瞭望。城墙顶上四周外侧都有垛口,垛口上有望孔,下有射眼,垛口上还有一层盖板。这样既可以防守又可以拒敌,敌强时可以拒守,敌弱时亦可出击。

拱极城城墙上面,设有旗杆12根。旗杆的位置分别为:四角楼旁各立1根,东西城楼各1根,南北两面城楼中心台和小敌台旁各1根。旗杆之间相距150米左右。现在旗杆已不复存在,但夹杆石尚存一部分。

夹杆石内现存的旗杆榫眼直径为30厘米左右,由此推知,在当时旗杆是相当高的了。

然而,江山易打不易守,俨若雄关的拱极城最终也没能挽回明朝灭亡的厄运,更阻挡不了民族融合的历史大潮流。



明天府政区图

西路厅

顺天府作为京师府制,其所辖州县数量远比其他一般府多,这就使得一些近畿地区的属地、管辖、巡察责任权交错,导致巡察缉捕事宜归属问题不清、互相推诿,很容易发生“盗匪潜踪”的案件,宛平县即在此种情况之列。也因此,给顺天府尹、直隶总督的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与不便。

康熙二十七年(1688年),在直隶总督于成龙的建议下,清政府开始在顺天府下设置东、西、南、北四路厅,并设有四路同知。其中,西路厅驻地就在拱极城,西路同知分管大兴、宛平、良乡、房山和涿州。

但西路厅的设立似乎并未彻底解决这一问题,因为雍正年间,直隶总督李卫就针对这一问题再次向雍正帝上疏,提出要尽快厘清近畿地方管辖权的建议。其《请定经界疏》

曰:“京师为畿甸重区,向有五城御史及巡捕京营,该管地方与州县互相交错,或地属州县而汛系京营,或汛辖外营而地为城属,即如长新店等处,街属城,房后属县,每逢雨水,道路泥泞,往来阻滞,而街非县管,呼应不灵。拱极城内数处管辖,保甲难稽。其他类此者,赌匪潜踪,彼此影射,命盗发觉,互相推诿,不一而足……似此近畿要区,岂容因循贻误!”(见《畿辅通志》)

四路厅设置初期,主要掌管捕盗事宜,乾隆十九年(1754年)开始兼管收取各州县钱粮事宜,到乾隆二十四年(1759年)以后,刑名案件也由各厅同知审转,并定四路厅的关防为“刑钱捕盗同知”。其中,西路厅还兼管永定河水利,因此,其关防加有“水利”二字。

四路厅名称	所领州、县	
西路厅	州:涿州	县:大兴、宛平、良乡、房山
东路厅	州:通州、蓟州	县:三河、武清、宝坻、宁河、香河
南路厅	州:霸州	县:保定、文安、大城、固安、永清、东安
北路厅	州:昌平州	县:顺义、怀柔、密云、平谷

